

早期漢學在西方

把《西遊記》譯成《猴子》

阿瑟·韋利(Arthur Waley)，堪稱20世紀初英國了不起的漢學大師。說起韋利對中國產生興趣還得先提到他的劍橋導師，韋利的老師曾假冒中國人寫了本《中國人眼中的西方》，署名「中國約翰」。「中國人如何看西方」在當時引起西方人爆炸性的好奇，也使韋利打算進一步了解東方世界。畢業後韋利來到大英博物館專職藝術品研究，當時大英博物館乏人研究東亞藝術，便請他兼職。出於工作需要韋利開始自學漢語，1917年韋利翻譯出版了《170首中國詩歌》。他在導言裡有這樣一句話：「中國有荷馬、埃斯庫羅斯、莎士比亞，或者托爾斯泰嗎？」他還評論：「對於西方詩歌來說，最重要的主題是描述男女間無窮微妙的感情；然而中國詩人通常所歌頌的則是朋友間的情意。」韋利雖然將中國詩歌譯介紹給西方人，但他始終不會講漢語。

韋利翻譯的中國詩歌，令西方讀者對東方文明大開眼界，當時媒體評論中國詩歌掀起的熱潮時形容：「讀中國詩歌，如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地激動和興奮。」中國詩歌熱銷離不開那個時代的背景，20世紀初的西方人，從報刊上讀到的中國消息不是戰爭就是饑荒，但當讀者從書架上取出韋利翻譯的中國詩歌集時，裡面所展示的則是另一個道德、文明、慈悲、誠實為社會準則的東方樂園。尤其歐洲經歷了一戰摧殘及1917年俄羅斯革命的衝擊，歐洲人開始悲觀地懷疑歐洲文明是否即將崩潰。當歐洲人從韋利的書中讀到另一端的東方文明，他們開始服膺中國數千年恆古不變的道德哲學，相信這就是文明古國多少世紀來

行之有效的治國之本。

熾熱的中國文學市場效益，使自信的韋利於1929年辭去大英博物館職位，成為一介獨立的東方文學譯者。上世紀30、40年代，他陸續出版了《詩經》(1937年)、《論語》(1938年)及《猴子》(節譯自《西遊記》1942年)。做為倫敦的一位學者，韋利偏愛「陽春白雪」風格的中國古詩，最為推崇白居易和蘇東坡。他自稱不是一個翻譯匠，他認為自己的文學風格與杜甫迥異，因此從未碰過他感覺譯不出「靈魂」的中國古詩。韋利被形容為「坐在家裡的觀察者」，因他從未光臨過亞洲。多年來，西方媒體紛紛載文表示「猜不透韋利從未涉足亞洲的原因」。上世紀30年代時曾有人邀韋利去中國遊覽，被他堅拒。到了60年代，垂暮之年的韋利終於道出拒絕前往中國的原由。他說：「中國對我來說，最熟悉的莫過於唐代的長安，但我估計如今那裡已有了一些改變。」這位漢學家為了不破壞腦海中的「古典長安」形象，寧願終生不踏足「變遷」後的「長安」。

《紅樓夢》的英譯本《石頭記》

韋利的朋友——《紅樓夢》的英譯者大衛·霍克斯(David Hawkes)，是20世紀後半葉英國著名漢學家。1948年，霍克斯在海上漂泊一個月後，經香港來到北京大學做研究生，那時他是北京城唯一的一位外國研究生。1951年秋，霍克斯返回牛津出任中文講師，後曾翻譯出版過《楚詞》。上世紀70年代之前的英譯本《紅樓夢》都是些節選本，1973年倫敦企鵝出版社發行了霍氏翻譯的《石頭記》(The Story of the Stone)第一卷，80年代前後

又相繼問世了其後的四卷。霍克斯認為將《紅樓夢》書名直譯為英文，會令讀者產生悖於曹雪芹原意的謬誤，而《石頭記》則最貼切曹氏的故事精神。霍氏翻譯了《紅樓夢》中的前80回，後40回的譯本是由其弟子閔福德完成，這也成爲一段漢學西漸的佳話，因爲閔福德由此成爲霍氏的乘龍快婿。霍氏的《石頭記》，在眾多的《紅樓夢》版本中成爲獨樹一幟的一套新版，霍氏雖以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的《紅樓夢》版本爲主要參考，但他同時也選擇了其他版《紅樓夢》中的一些內容，最後形成霍氏編輯版的《石頭記》。

若右手持原文《紅樓夢》，左手持霍氏的英譯《石頭記》，你會感受到二者的精髓和韻味是渾然一體的，小說中原有的幽默、節奏都得到了精彩、準確地傳達。霍氏的《石頭記》，與大陸楊憲益夫妻合譯的《紅樓夢》分庭抗禮之下，楊氏版本單獨欣賞時不易察覺的文采欠妥之處，經與霍氏版本之比較，就較易辨出霍氏藝高一籌。霍克斯在譯者序言中表示：「原著雖然是一本未完成之作，但它是一位偉大作家嘔心瀝血的結晶。我認爲，凡是書中的內容都有其價值。所以我要將書中的一切都翻譯出來，甚至包括雙關語也要表達出來。我不自視所有的細節都處理得完美，但如果讀者能從這本中國小說中獲得樂趣，哪怕他們僅僅感受到我讀它時所獲樂趣的百分之一，我也就不虛此生了。」

霍克斯與韋利的觀念一致，當詢問他何時再回北京看看。他表示：「1948-1951年時代的北京，我仍記得清清楚楚，我常在夢裡雲遊。因此我不打算去看一個我不認識的北京，那樣會破壞我記憶裡的老北京。」

龐德的壯麗錯誤

20世紀初，美國詩人龐德堪稱當代文學革命的先鋒。可以肯定地說，龐德的當代新文學思潮，與他拜讀和翻譯了許多中國、日本詩詞所受到的薰陶密切相關。當年我讀龐

德譯的中國古詩時，詫異所謂西方當代新潮詩歌，原來中國人在一、二千年前就已經這麼寫了。談到龐德譯中國古典詩歌，還有一些有趣的軼事。龐德最初不懂中文，他旅居日本的好友佛洛諾薩，是位研究東方文學藝術的先驅，佛氏常用日文讀中文書。佛氏過世後，其日語版《漢書》筆記轉到了龐德手中，龐德深爲著迷。由於日學家佛氏不懂中文，其中國詩歌筆記都是日本化的，比如李白被寫成Rihaku，陶淵明變成To Em-mei。龐德持日文的中國詩詞筆記，以他超乎尋常的想像天分翻譯創作出「中國詩歌」。起初龐德曾誤以爲一個漢字的左右兩偏旁意味著兩個字。就這樣，龐德誤讀或猜偏旁的地方，都經龐德的「活譯」加創意而變得更加絢麗，被詩人楊煉稱爲Magnificent Mistakes（壯麗的錯誤）。

1915年，龐德出版了中國古詩英譯本《中國》，共收錄317首詩詞，大部分是李白的作品，其中還包括古詩《青青河邊草》。詩集扉頁上，龐德註明其譯作是以佛洛諾薩的筆記，以及莫利(Mori)和埃利加(Arigo)兩教授對筆記的解釋爲根據。顯然龐德借助日語筆記讀漢詩，其譯作與原文的出入便在所難免。比如，李白的《長干行》，龐德的譯本成爲《水路商人妻子的一封信》，而《青青河邊草》的英文標題是《美麗的梳妝台》，從而創作出龐德個人浪漫風格的英文中國古詩。龐德從譯中國古詩入門，進而研究起中國古代文明和儒學思想，龐德推崇的東方古風在其詩作裡也得到體現。比如龐德將自己一筆一劃描畫出來的漢字，鑲嵌進其創作的詩文中，同時還用羅馬拼音字母將「堯」、「舜」、「禹」做爲詩作中的一行詩。20年後龐德中年時，他的漢語有了長足的進步，可以讀懂康熙字典。於是他開始翻譯《詩經》，龐德認爲《詩經》既然是中國草根百姓的民歌，故他開創了用美國民歌的文風來闡述《詩經》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。